

卢梭的平等思想及其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实践

——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

周 友 光

罗伯斯比尔曾经指出：“法兰西革命是第一次建立在人权理论和正义原则基础上的革命^①”，“这场革命，导师是卢梭”^②。

罗伯斯比尔对卢梭的崇高评价，是并无夸张的。如果说，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以自由思想作为它的理论依据的话，那末，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则以平等思想作为它的主要理论旗帜。无疑，这是资产阶级反封建思想的一次重大发展。卢梭的主要历史功绩，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在“平等要求的资产阶级方面是由卢梭首先明确地阐述的”^③。卢梭平等思想的提出，为法国大革命的理论 and 原则奠定了主要基础，卢梭主义也因而成为大革命中最有影响的指导思想。

卢梭平等思想是以“人”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这部名著中，卢梭写道：“人类的各種知識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備的，就是‘人’的知識”^④；在他看來，戴爾菲城神廟的碑銘“你要認識你自己”這句箴言，“比倫理學家的一切巨著都更為重要、更為深奧”^⑤。因此，盧梭宣稱：“我要論述的是人”^⑥。其實，在盧梭的其他著作中，主人翁又何嘗不同樣是“人”呢？！盧梭之所以大聲疾呼“人”這個字眼，是為了喚醒人類的人權意識。盧梭不愧他自己所說的是個誕生於人民中間的思想家。他根據自然權利的學說，毫無顧忌地把天賦人權的思想，發揮到他那個世紀的最高水平，并在自己的理論旗幟上，寫上了“人，不要凌辱人”^⑦這個反映時代強音的口號。為了實現人的尊嚴和權利，盧梭首先把平等原則提到最重要的位置。他認為，如果不先使一個人陷於不能脫離另一個人而生活的狀態，便不能奴役這個人。因此，自由是以平等作為前提的，沒有平等，自由便不能存在。普列漢諾夫寫道：“這個人民的兒子是真正熱愛平等的”，“他說到平等時，聲音里迸發出奔騰澎湃的革命熱情”^⑧。在所有的平等要求中，盧梭又把經濟平等的原則提到了首要位置。盧梭否認洛克關於私有財產是一種自然權利的觀點。他認為，由於私有制的產生，人類才依次出現了富人和窮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主人和奴隸。由於“各種不平等最後都必然會歸結到財富上去”^⑨。因此，要實現人的平等權利，首先便必須實現經濟上的平等，做到“人人都有一些東西而又沒有人能有過多的東西”^⑩。盧梭在探索人類私有制的起源時，特別注意到土地私有制的產生。對此，盧梭有這樣一段人所熟知的論述：“誰第一個把一塊土地圍起來並想到說：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頭腦十分簡單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話，誰就是文明社會的真正奠基者。假如有人拔掉木桩或者填平溝壕，并向他的同類大聲疾呼：‘不要聽信這個騙子的話，如果你們忘記土地的果實是大家所有的，土地是不屬於任何人的，那你們就要遭殃了！’這個人該會使人類

免去多少罪行、战争和杀害，免去多少苦难和恐怖啊！”^⑪由于人类未能阻止土地私有制的出现，从此，奴役和贫困便“伴随农作物在田野中萌芽和滋长”^⑫。卢梭认识到，历史已无法倒退到原始的“自然状态”，人类也不可能重归森林去和熊一起生活，所以，承认财产权是公民的神圣权利是必需的。然而，卢梭又坚定地认为，让少数人把幸福建筑在多数人不幸之上的现象是极不公平的，因此，国家应该把反对不平等的斗争作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并通过实施某种平均主义的方案来限制私有制。他写道：“使一切人的财产不知不觉地接近于乃是社会的真正力量的中等程度（中等财产）的这种政治，乃是国家的目的”^⑬。卢梭呼吁减轻农民的负担，他指出，凡是农民什么也不缴纳或者缴纳得很少的地方，也就是土地耕种得最好的地方。卢梭十分重视国家的作用，在他的另一名著《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完整地阐述了人民主权的思想，并据此绘制出一幅民主共和制度的蓝图。

1764年，当卢梭发表《山中书信》的时候，瓦特正在英国发明了蒸汽机。显然，当资本主义已伴随着工业革命阔步走上欧洲历史舞台中心的时候，卢梭以全面平等的原则为框架构建的理想社会的大厦，不能不是一种虚构的幻想。在社会平等这个问题上，人们不难从同时代的其他一些启蒙家那里，找到许多比卢梭更“现实”、更“理智”的言论。例如，伏尔泰就说过：“在我们不幸的土地上，要想使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不划分成为两个阶级：一个是富的，是指挥者；另一个是穷人，是服务者——这是不可能的”^⑭；霍尔巴赫也宣称：“人们永远是不平等的。我们不必说一些响亮的空话去反对这个永远必需的不平等”^⑮。然而，尽管如此，法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却仍然把卢梭的社会平等思想当作福音。这是因为，尽管卢梭作为18世纪的思想家，就他的学说体系和方法来说，并未能摆脱那个时代思想家所共有的抽象性和虚构性。但是，卢梭的目光却从未离开过法国的社会实际，他的心也始终与城乡劳苦大众的心相通。因此，卢梭学说的内容，却又是极其真实的。卢梭以社会平等为基础的平等思想，无疑是对18世纪法国不公平社会的坚决否定，反映了法国第三等级尤其是广大农民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不愧为当时法国“最革命的思想”。

自从法国的思想家升起了第一面平等的旗帜后，平等思想便开始在人类历史上产生出它的永久的号召力。尽管不同时代的不同人们对于平等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实现平等的道路也坎坷而漫长。然而，各个时代的先进人们，却总把某种社会平等或社会公平原则的实现，看作是合理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并为之不懈地努力。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平等原则的第一次伟大实践。

法国大革命一开始就把公民的平等提到了首位。在巴士底狱攻陷后不久，制宪会议即通过“8月4日之夜”取消了封建贵族的司法、养鸽、狩猎、免税等特权。8月26日，制宪会议又以140票的多数通过了著名的《人权宣言》。宣言首先指出：“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所以决定把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人权阐明于庄严的宣言之中”，接着，宣言宣布了17条“人与公民的权利”。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由其代表去参预法律的制定”，“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1790年6月20日，所有爵位、纹章以及勋章骑士团也均宣布废除。1791年9月3日，制宪会议又进而颁布了冠以《人权宣言》的宪法。至此，公民在法律上平等的原则终于完全代替了封建的等级特权的原则。

虽然卢梭主义在这个时期尚未占居绝对的统治地位，但我们仍不难从上述事件特别是《人权宣言》中看到卢梭著作的影响。自从公民平等的原则被宣布后，法国平等思想的风气大开。

1792年6月20日，到议会和王宫示威的群众宣称：“人民的头颅也和戴王冠的专制国王的头颅一样。人民是民族世系这颗大树上的主干”。巴黎无套裤汉在给议会代表写信时，常以“你的法律上的平等者”署名。历代国王塑像均被推倒，罗亚尔宫改名为平等宫，奥尔良公爵也宣布改名为菲力普·平等。

当平等原则从书本走向社会，成为千百万普通群众的口号时，平等原则便具有一种力求获得实际表现的顽强趋向和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自《人权宣言》发表后，法国普通群众日益察觉，法律上宣布的平等是与实际生活严重脱节的。造成这种脱节的原因，是当权的资产阶级在废除等级特权的同时，又竭力维护和强化财产的特权。其最初表现是《人权宣言》中宣布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接着，又有制宪会议对农民封建义务的确认以及《戒严法》、《惩罚法》、《列·夏普利埃条例》的颁布；最后，在1791年宪法中，更公然根据财产资格，把绝大多数公民贬为“消极公民”，剥夺了他们选举和当选立法议会代表的权利。历史学家米涅写道：“在胜利的时刻，人们不滥用权威那是少见的。要平息人们的情绪，重要的是制止对这种权力的滥用，使人民在要求取消特权的同时不把特权和所有权混为一谈”^{①6}。米涅的上述言论是对制宪会议立场的很好说明，也就是说，在制宪会议看来，维护私有制度应该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

在人民起码政治权利落空的同时，更为紧迫的是，人民的生存权利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在法国处于革命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战争环境中，粮食和日用品严重匮乏，商人乘机囤积居奇，结果造成了指券贬值、物价恶性上涨的经济局面。1792年，小麦价格比上年上涨40%，黑面包价格也上涨33%^{①7}。政府却遵循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奉行经济自由主义。在这一年，担任内政部长罗兰仍宣称：“关于生活所需的粮食问题，国民公会唯一允许它做的事，是声明它应当什么也不做”。结果，法国南方许多地方的农民不得不以干草充饥，首都巴黎“要面包”的呼声更加高涨，粮食骚动与农民暴动也持续不断。

还在制宪会议时，三巨头之一的迪波尔就曾抱怨说：“人们老是给我们讲原则，为什么不考虑稳定性也是政府的一个原则呢？”^{①8}然而，当人民发觉在震天价响的“平等”声中，他们连起码的生活温饱问题也没有保障的时候，要实现稳定是不可能的。

在革命和战争环境中不择手段致富的新暴发户，这时成为群众最直接憎恨的对象，被称为在“战争中大捞一把的铁青面孔的人”^{①9}。1793年6月，忿激派领袖扎克·鲁在国民公会慷慨陈词：“4年以来，革命只是使富人得到好处，现在商业贵族对我们的压迫比门阀贵族还要凶”，“如果富人利用垄断地位操纵着那些在法律上应当同他平等……的人的生死大权，那末平等就不过是海市蜃楼”^{②0}。两个月后，他在《关于起诉投机商、囤积者和卖国贼的演说》中又说道：必须让那些无孔不入的“邪恶公民交出所占有的一切”，扎克·鲁特别指出：“这些议员，在他们出乎意外地飞黄腾达之前，每天一个埃居也花不起，而今天却都成了大财主”^{②1}。肖美特也大声呼吁：“要过自由的生活，总得有生活的条件啊！”^{②2}“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诺言。是面包，而且必须立刻得到”^{②3}。

客观形势需要法国大革命把反封建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战争进行到底，然而，当群众普遍认为“大革命一事无成”的时候，又怎能激动他们去为革命献身呀？雅各宾派对此是有清醒认识的。罗伯斯比尔曾写道：“人民必须和国民公会联合起来，而国民公会要为人民工作”^{②4}。圣鞠斯特也指出：“不幸福的人民是没有祖国的”^{②5}。圣安德烈更加明确地写道：“必须十分急切地使穷人活下去，如果你们要使穷人帮助你们去完成革命的话”^{②6}。

恩格斯曾说过：“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

还应当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②7}。当时,法国群众所要求的也正是这样。适应形势的需要,以提倡经济平等和人民主权为特色的卢梭主义,终于在群众心目中获得了最高权威的地位,成为大革命的指导思想。

如前所述,法国革命后社会不公正的问题,是通过普通群众温饱问题无法解决这种现象,最直接、最尖锐地表现出来的。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比尔,作为卢梭主义的信徒,他认识到为了解决严重的经济问题,就必须把卢梭式的经济平等纲领引进到大革命中去。在这种意义上,罗伯斯比尔宣布:“平等的统治正在开始”。1792年12月2日,罗伯斯比尔作了《关于生活必需品》的著名演说,明确指出:“首要的权利是生存权,其他权利都要服从它”。这里,罗伯斯比尔实际上已经把千百万普通群众的温饱问题提到了头等重要的地位。1793年4月24日,在另一次《论财产》的著名演说中,罗伯斯比尔又进而根据卢梭的学说,对所有权含义作了阐发。他说:“所有权是每个公民使用和支配法律保障他享有的那部分财产的权利”,“所有权也和其他权利一样,受到尊重他人权利的义务的限制”,“所有权不能损害我们周围人们的安全、自由、生存和财产”,“违反这个原则的任何占有、任何交易,都是不合法和不道德的”^{②8}。这是完全不同于罗马法的一种全新的解释。按照这种解释,所有权已经受到了法律、公民责任心和社会道德准则的约束,已经不是绝对“神圣不可侵犯”的了。这就为限制私有权提供了法律上的根据。

在大革命的环境中,一切重大问题都属于政治总问题的组成部分,一切重大问题的解决也都诉诸于政治的方式。经济问题也不例外,最初,雅各宾派的领袖曾认为通过实现卢梭式的民主政治可以缓解经济形势。早在1792年秋,罗伯斯比尔就指出,在一个以财产不平等为基础的会里,普选权可以作为抵制金钱统治的好办法之一。

大家知道,《社会契约论》是卢梭论述民主共和政治学说的最重要著作。但是,在大革命前,不论是这部著作的作者还是他的读者,都把该书所阐述的观点看作是一些假定的抽象原则。那时,人们对现实问题的关注,还远远超过对民主政治抽象原则探讨的兴趣。因此,卢梭这一著作反而较少引人注目。法国革命发生后,民主政治实践的需要,终于逐步唤起了人们对《社会契约论》的重视。雅各宾派上台后,首先致力于宪法的制订工作。起草委员会仅用6天时间就提出了一部新的宪法草案,并于1793年6月24日由国民公会予以通过。1793年的雅各宾宪法是一部典型的卢梭式宪法。它宣布法国为民主共和国,宣称“最高的人民是法兰西公民的总和”,明确规定了人民的普选权(凡年满21岁的男子均享有不受财产限制的直接选举权)、立法权(立法会议通过的法律须交全国公民投票决定)、对各级官员的罢免权、起义权。还宣布了劳动权和生存权。这部宪法在交全民投票时,获180多万人拥护,反对者只11万人。卢梭民主政治的原则,这时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真理。拉卡纳尔写道:“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革命替我们阐明了《社会契约论》”^{②9}。

但是,法国大革命有它自己的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发展道路。由于国内外形势所迫,大革命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一起,实际上并不是按照民主的原则而是依靠强制的手段予以解决。1793年宪法通过后即被装入议会主席台前的柏木柜内,决定在战争结束前暂缓实施。从1793年秋天起,“恐怖”这个字眼开始出现和流行起来(但革命恐怖的行动在此之前已经产生)。雅各宾派的领袖都一再为革命恐怖政策辩护。罗伯斯比尔最初是坚决反对执行死刑的,但在1792年12月9日,罗伯斯比尔宣称:“路易应该死,因为祖国必须生”^{③0}。到了1793年,他又进而宣称:“王党分子必须灭亡,共和主义者必须胜利”^{③1},成为一位坚定的革命恐怖主义者。罗伯斯比尔反问道:“你们想要一个没有大革命的革命吗?”^{③2}。圣鞠斯特在10月10日

报告中也指出：“必须用铁去治理那些不能用正义治理的人，必须镇压那些压制者”^③。这时，政府的措施实际上已不是根据抽象的民主原则，而是罗伯斯比尔所说的：“法律来自需要”^④。

1793年6月3日，国民公会颁布法令，规定小股拍卖亡命者的土地；6月11日又决定将村社公有土地按人口分配；7月17日更进而宣布无偿废除一切封建义务，所有有关农民欠缴租款的诉讼案均不予受理，领主必须在三个月内交出封建契据并由刽子手当众烧毁。

7月26日，国民公会颁布严禁囤积居奇的法令，责令商人出售库存商品，违者处以死刑。

8月9日，救国委员会颁布向农民征发实物的法令。

9月3日，规定统一全国各地粮食价格，禁止私人买卖粮食。

9月5日，根据埃贝尔建议，“为了到敌人的巢穴去找敌人”，组织了一支几千人的革命军，负责征粮、征兵和镇反工作，并以断头台作为“复仇的致命武器”（肖美尔语）。

9月25日，国民公会颁布了著名的全面限价法，对违法者给予严惩直至送上断头台。

1794年颁布的《风月法令》规定，没收革命敌人的财产并将其无偿分配给贫苦公民。

同年6月26日，国民公会颁布法令，规定普遍征发粮食和饲料，农民如不据实呈报产量，将被没收全部收成。

雅各宾革命政权的其他经济措施还有：

实行累进所得税，规定收入在1千利维尔以下者免税，收入在9千利维尔者应纳重税；

向城市富人强迫借款，如圣鞠斯特在斯特拉斯堡时就曾下令，交款如迟1天即处以1个月的监禁；

废除长子继承权，规定遗产平分；

决定在全国举办社会救济事业，颁布消除乞丐和救济贫民的法令，规定发给产妇和抚养两个以上子女的劳动者补助金，凡丧失劳动力者和贫民每天可得15—25苏津贴，凡参加各区大会的人每天可得40苏补贴，发给60岁以上老人养老金；

颁布在各区成立粮仓的法令；对面包、肉实行定量供应；对面包质量作了统一规定，这种面包被称为“平等面包”。

上述各项措施，都具有限制财产和抑富济贫的性质，体现了卢梭财产平均的思想。为了供应120万军队和城市居民生活必需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雅各宾派采用经济统制和恐怖手段来贯彻各项措施，是必要的和有成效的。梯也尔和米涅也承认，恐怖是一件必需的坏事，没有恐怖就挽救不了祖国^⑤。

但是，经济平等的问题，归根结底，必须依靠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后才能逐步实现。而当时法国面临的紧急形势，却迫使雅各宾派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条件下，在一个以农业为主并且经济生活遭到严重破坏的国家中，提出并试图解决经济平等的问题。尽管雅各宾派的措施可以短期地缓解国内经济困难，但雅各宾派所走上的，却是一条最终注定要以失败告终的道路。雅各宾派所导演的，也只能是一幕历史的悲剧。

由于雅各宾派的领袖企图以大革命的方式解决它所面临的一切经济的、政治的问题，对政治的片面迷信便随之增长，政治权力也日益失控。“敢干，就是全部革命的秘密”^⑥，圣鞠斯特这句名言表明，在雅各宾派的领袖们看来，政治斗争已经成为了一种万能的手段了。根据必然的逻辑，为了高效率地发挥政治斗争的作用，便需要绝对的权威和权力高度集中。罗伯斯比尔因而提出：“只能有一个意志”^⑦。圣鞠斯特则声称，应当让法律的威力普及四方，

使政府的权威到处有所体现。救国委员会经改组后，由清一色的雅各宾党人组成，并拥有任命高级军官、部长、专员、审判官、陪审官甚至直接逮捕国民公会代表的无限制权力。一切派别上的斗争和分歧，都被提上革命与反革命的高度上予以解决。罗伯斯比尔作过这样的说明：“两派（指当时的左派和右派）虽然打着不同的旗号，走着不同的道路，他们所追求的目的却是一个，这就是倾覆人民的政府，瓦解国民公会，使暴政得逞”^⑳。即使在弗勒吕斯战役胜利之后，罗伯斯比尔还是一味提出要对“无所不在”的反革命“提高警惕”。圣鞠斯特也宣称：“共和国之所以成为共和国，就是消灭反对共和国的一切”^㉑。在革命的狂热中，革命的全部精巧艺术，越来越被一些人用一种简单、粗鄙的逻辑来取代。例如，曾有国民公会代表质问：“如果时刻担心被捕，谁还敢自由发表意见”，他得到的反驳是：“谁要是因为怕被捕而不敢发表意见，就不配做人民代表”。与此同时，罗伯斯比尔也被推上革命的最高权威地位。1793年7月后，他实际上成为政府首脑，以后又被选为国民公会议长。拥护或反对罗伯斯比尔，成为划分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准。罗伯斯比尔的追随者至死也坚信：“罗伯斯比尔的敌人就是祖国的敌人”。为了强化对群众的影响和控制，雅各宾派把许多群众团体纳入政府机制，并由政府派员担任领导人。随着这些团体的“官方化”、“机关化”，雅各宾派也日益失去了与群众的联系和来自群众的监督。

雅各宾派还力图借助宗教力量来为政治斗争服务。1794年2月5日，罗伯斯比尔向国民公会提出了《关于国民公会的政治道德的指导原则》。5月7日，国民公会根据他的建议通过了《花月18日法令》，法令第一条规定：“法国人民承认存在最高主宰和灵魂不死”。罗伯斯比尔把最高主宰看作是德行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他所提倡的，实际上是一种道德宗教，而这种新宗教，是应该服务于雅各宾的政治需要的。6月8日，即最高主宰节，罗伯斯比尔亲自率领国民公会全体代表参加巴黎50万人的庆祝游行，并发表演说号召公民们“对恶人和暴君斗争”。

当政治斗争被无限夸大和失控之后，曾经具有历史正当性的恐怖政策，便逐渐越出了它的合理临界线而变成了“荒谬”。继里昂、波尔多、马赛、土伦由少数人制造的滥杀事件之后，1794年3月和4月，忿激派与丹东派先后被镇压，6月恐怖统治终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其标志是《牧月法令》的颁布。这项法令笼统规定：“凡是与人民为敌的都是罪犯”，“凡有企图使用暴力或用阴谋来破坏自由的人都是人民的敌人”，而对共和国的一切敌人，只有死刑一种判决；为加速对敌人的处决，法令废除了预审制度，审判时也无需有证人、辩护人出庭。库东为这个法令辩护时说：“任何拖延都是犯罪，一切宽容的程序都是对国家的危害；惩罚祖国的敌人的期限只应该是判明罪行的时间”^㉒。《牧月法令》的颁布，使一切法制荡然无存。在47天之中，被送上断头台的达1376人，超过前14个月中处决人数。著名诗人谢尼埃和科学家拉瓦锡都死于恐怖时期。

历史表明，雅各宾派的任何努力都不可能遏制资本主义的经济进程。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刺刀碰上了尖锐的‘社会’问题会变得象软绵绵的灯芯一样”^㉓。雅各宾派的领袖对此多少是有所觉察的。事实上，在雅各宾派专政后期，极端的经济统制手段已开始放松。圣鞠斯特也在认真思索如何使社会和政府避免唯利是图法则侵袭的途径，在《共和国制度论》中，他写道：“恐怖可使我们摆脱王政及贵族政治，什么才能使我们免于腐化呢？制度”^㉔。但是，历史有时是十分吝惜时间的，1794年7月27日发生的“热月政变”，终于匆匆结束了雅各宾派专政，从而也中断了他们关于社会平等的实践和探索。

卢梭以平民方式表达的具有空想性质的平等学说，最终只能在现实的土壤上，被改造成

为反映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关系的原則。如恩格斯指出：“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平等；被宣布为最重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所有权；而理想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③。不过，尽管卢梭平等思想作为一种浪漫主义思潮，在18世纪的实践中流产了，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200年间，平等观念却始终保持其历史魅力而从未在历史舞台上消失。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在19世纪70年代的著作中曾指出，平等观念作为一种历史的产物，并不是永恒的真理，也不能把社会主义抽象地看成是一个平等的王国，但同时又承认，平等要求“差不多在一切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起着很大的鼓动作用”^④，在当时“仍然合乎潮流”^⑤。今天，在新的历史时代条件下，确定平等观念的科学内容，研究平等观念在当代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探索实现平等观念的途径，仍然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为此，回顾和总结卢梭平等思想及其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实践，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注释：

①② 罗伯斯比尔：《革命法制与审判》，商务印书馆1965年中译版，第197、137页。

② 引自李凤鸣、姚介厚：《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198页。

③ 《马恩全集》第20卷，第669页。

④⑤⑥⑨⑪⑫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82年中译版，第62、70、143、111、121页。

⑦⑬⑭⑮ 勃·姆·列尔纳狄涅尔：《卢梭的社会政治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3、105、79、82—83页。

⑧ 普列汉诺夫：《让·雅克·卢梭和他的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学说》，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附录(二)，第238—239页。

⑩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中译版，第34页。

⑪⑬⑮⑯⑰⑱⑲⑳ 米涅：《法国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77年中译版，第51、101—102、242、224、224—225、236页。

⑪ [法] 马尔克·布洛瓦索：《雅各宾共和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英译版（乔纳森·曼德尔鲍姆译），第18页。

⑲ 鲁德：《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三联书店1963年中译版，第152页。

⑳②② 卢金：《罗伯斯比尔》，商务印书馆1963年中译版，第137、134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 波普朗：《论罗伯斯比尔》，见华东师大《外国史学摘译》9—10期。

⑲⑳ 王养冲编：《阿·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论选》，华东师大出版社1984年版，第60、8页。

㉑⑬⑭⑮ 《马恩选集》第3卷，第146、57、142、147页。

㉒ 沃尔金：《18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译版，第246页。

㉓ 马迪厄：《法国革命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中译版，第546页。

㉔ 《马恩全集》第5卷，第543页。

㉕ 杨人鞭：《圣鞠斯特》，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6页。